

《纽约客》 (The New Yorker)

行动主义年鉴 (Annals of Activism) · 2021年9月13日刊

<https://www.newyorker.com/magazine/2021/09/13/who-lost-the-sex-wars>

作者：阿米亚·斯里尼瓦桑 (Amia Srinivasan)

本文刊登于2021年9月6日

译者：許顛頊 (代词 they/them/祂/TA)

谁输了性战争？ (Who Lost the Sex Wars?)

女性主义运动中的分歧 (fissures) 不应作为失败的标志而被掩埋，而应作为深刻理解 (insight) 的机会来思考解决 (worked through) 。



在今天，最引人注目的女性主义辩论之一便是关于跨性/别女人 (trans women) 的位置。插图：露西-琼斯 (Lucy Jones)；选用照片来源：盖蒂图片社 (Getty)。

翻译说明（部分直接复制自译者之前译文内的声明）：

1. 译者的翻译是以冗长的词意叠加以及对原文的尽可能保留（词汇、结构等）为主要方式，同时译者不在意格式规范（比如会刻意使用空格、破折号来引导阅读节奏）亦或其它相关翻译规范。本文全部注释均为译者注释。

2. 译者的翻译是僵硬的，没有把握住行文的细微差异（nuance），但是**强调性别包容**。“sex”译为“性”、“gender”只译为“性别”；当“**trans**”独立使用时翻译为“**跨儿**”，其它情况下翻译为“**跨性/别**”；“**transsexual**”将译为“**跨性**”（本译文虽希望保留其历史含义与当代诠释，但完全不希望其作为译文被引入时，被译为“变性”这样在**部分中国跨儿与非二元者社群中被视为具有贬损色彩的词汇**）；“**woman**”译为“女人”，但妥协于中文已有的词汇组合，有时翻译为“**妇女**”，当然，译者在其它词汇的翻译上还是一贯的倾向于拗口、机械、不协调。

3. 译者再次为本译文中蓄意出现的拗口词汇组合表示抱歉。

位于英国牛津的罗斯金学院（Ruskin College）成立于1899年，旨在为那些被排除在高等教育之外的工人阶级男人（working-class men）服务，并于1919年开始实行多性别同校制（coed）【1】。在1970年，它是首届全国妇女解放运动会议（National Women's Liberation Movement Conference）的举办地。妇女解放团体（Women's-liberation groups）已经在英国各地举行了会议，其受启发于美国备受瞩目的妇女运动（the high-profile women's movement）；欧洲、亚洲、和拉丁美洲的反殖民主义和支持民主的斗争；以及离家乡较近的，在达格南（Dagenham）和赫尔（Hull）的工人阶级妇女罢工（working-class women's strikes）。但是，对于聚集在罗斯金会议的女人们（women）来说，那里是一个兴奋的巩固合并时刻（a heady moment of consolidation）。一位与会者，剧作家米切林·旺多尔（Michelene Wandor），将罗斯金会议描述为是一个“令人振奋和困惑的启示（exhilarating and confusing revelation）……六百位女人们……坚定不移想要改变世界和我们作为女人的形象”。

【1】“coed”一词为“co-educational”的缩写，不能理解为“男女同校”，**性别不是只有两种**。
——译注

会议提出了几项要求：薪酬、教育和工作机会的平等；免费避孕；按需堕胎；以及免费的二十四小时托婴儿所。然而，这些要求（尽管在很大程度上仍未得到满足）远远低估了（undersell）在罗斯金的女人们所试图实现的激进主义（radicalism）。正如女性主义历史学家和罗斯金组织者之一的希拉·罗伯坦（Sheila Rowbotham）在她的新回忆录《敢于希

望：我在20世纪70年代的生活》（“Daring to Hope: My Life in the 1970s”）中所写的那样，这些措施看起来能轻易实现并且没有什么野心。“改革（reforms）没有解决影响工人阶级妇女的根本不平等（the underlying inequalities），”她写道，“也没有解决许多像我这样受过大学教育的年轻中产阶级女人们所经历的扩散性的受压迫的社会错位感（the diffuse sense of oppressed social dislocation）。”

对于罗伯坦（Rowbotham）和其它主导英国妇女运动（British women’s movement）的社会主义女性主义者（socialist feminists）来说，妇女解放与资本主义的废除瓦解（dismantling）密切相关。但是，这也要求——在这点上，TA们与守旧的保守左派不同（the Old Guard left）——重新思考日常的生活模式（everyday patterns of life），涉及到性（sex）、爱、家务、养育孩子（child rearing）。罗斯金会议最有代表性的照片不是女人们（women），而是男人们（men）：负责在周末进行日托护理（day care）的男性伴侣们（male partners）。在这张黑白照片中，两个男人坐在地板上，周围都是小孩子；其中一个著名的文化理论家斯图尔特·霍尔（Stuart Hall），他把一个熟睡的幼童抱在胸前，意味深长地看着镜头。



右侧为 Stuart Hall，在1970年的罗斯金会议期间于crèche（日间托儿所）工作；非原文配图。

在许多当代英国女性主义者中，尤其是那些经历过解放运动发展（the arc of the liberation movement）的人，罗斯金既让人感到遗憾，也让人感到希望——一个没有实现但仍有可能实现（delivered）的承诺。在去年2月，牛津大学举行了纪念罗斯金会议50周年的活动。这次活动没有标志性的照片，但有着一段声名狼藉的 YouTube 视频。它展示着与会者要求知道为什么原本被安排在聚会上发表讲话的，于牛津大学任教的女性主义历史学家塞林那·托德（Selina Todd）被“撤除演讲（deplatformed）”。实际上，在其它发言者扬言要进行抵制活动（a boycott）之后，她就被撤销了（dropped），原因是她参与了 Woman's Place U.K 组织的活动，这是一个主张要将跨性/别女人（trans women）排除在女人空间（women's spaces）之外的组织。（会议结束后几个月，人们发现托德在牛津大学领导的一个关于女人和法律历史的项目向 Woman's Place 支付了2万英镑的“咨询费 consultancy fee”，这是该组织在2018年至2020年期间最大的收入来源。）愤怒的观众之一是朱利·宾德尔（Julie Bindel），她是一位开展反对男性暴力（male violence）、反对性工作（sex work）、和反对跨性/别者权利（trans rights）活动的激进女性主义者（radical feminist）。“想想一个只由跨性者（transsexuals）居住的世界。它看起来就像《油脂》（Grease）里的场景。”，她说道，“一个一生都在为被剥夺权利的女人（disenfranchised women）辩护的女性主义者，被告知她过于危险和邪恶（vile）所以不能发言，你认为这种感觉会如何？”观众们进行了一场自发的投票活动，绝大多数人支持让托德发言，但那时她已经离开了会场（premises）。

那些抗议托德演讲被撤除（Todd's deplatforming）的人倾向于认为活动的组织者违背了最初的罗斯金会议的精神。牛津大学历史学院董事会主席约翰·沃茨（John Watts）也这样认为：“我们相信，辩论总是比排斥（exclude）要好。这在我们看来是1970年的一个关键原则。”然而，罗斯金也有自己的排斥性（exclusions）。就像纪念它的2020年会议一样，罗斯金会议绝大多数是白人和中产阶级（white and middle class）。戈林·宾（Gerlin Bean）是为数不多的参加该活动的黑人女人之一，她认为她“无法真正挑出”这个活动“与黑人女性有关”的一丝相关性（relevance）。（宾后来共同创立了具有影响力的“非洲和亚洲裔妇女组织” Organisation of Women of African and Asian Descent）无论2020年牛津会议的分歧性（divisiveness）是否于1970年的精神一致，它肯定与英国运动后期发展的精神相符（the spirit of later episodes in the British movement），正如其断层带（fault lines）在70年代期间越发明显。

它们在大西洋的另一边也很明显。美国的妇女解放运动（women's-liberation movement），从其在六十年代末的出现开始，其就以，认为阶级从属/阶级下等（class subordination）是女人受压迫之根源（the root cause of women's oppression）的社会主义女性主义者（或“政客 politicos”）和认为“男性至上主义（male supremacy）”是社会与政治

生活的自主自发结构 (an autonomous structure of social and political life) 的女性主义者之间的紧张关系为特征。与此同时，拥抱分离主义 (separatism)、以及有时候拥抱政治蕾丝边主义 (political lesbianism) 作为唯一可接受的对男性至上主义的回应的女性主义者 (如狄-格雷丝·阿特金森 Ti-Grace Atkinson 和 洛葛仙尼·邓巴-奥尔蒂斯 Roxanne Dunbar-Ortiz) ——与——由于这种路线对异性恋欲望的斥责 (rebuke) 以及对“非参与运动的 (non-movement) ”女人的疏远异化倾向，因而拒绝这种“个人解决主义 (personal solutionism) ”的女性主义者 (如红袜子组织的“支持女人”成员 the “pro-woman” members of the group Redstockings, 该组织由 舒拉米斯·费尔斯通 Shulamith Firestone 和 艾伦·威利斯 Ellen Willis 于1969年创建) ——之间的紧张关系日益增长。

在1978年，第十届全国妇女解放运动会议 (National Women's Liberation Movement Conference) 于英格兰伯明翰举行。自我认同为“革命女性主义者 (revolutionary feminists) ”的人提交了一份提案，要求取消以往会议上所确立的要求 (demands)，坚持认为“向一个父权制国家 (a patriarchal state) ——向男人们——提出任何要求对我们来说都是可笑的，因为它们是敌人。”革命女性主义在前一年受到了洗礼考验 (baptized)，当时希拉·杰弗里斯 (Sheila Jeffreys) 在题为“革命女性主义的必要性”的讲座中，责备社会主义女性主义者没有认识到男性暴力才是女人受压迫的根源，而不是资本主义。在伯明翰会议上，革命女性主义者的提案被排在全体议程之外，而当它最终被大声宣读时，混乱爆发了：女人们呼喊 (shouted)，歌唱 (sang)，并从彼此手中争夺走 (wrenched) 麦克风。许多与会者离开了现场。这是最后一次全国性会议。

在伯明翰发生的事情预示了 (prefigured) 四年后在纽约的巴纳德学院 (Barnard College) 所发生的事情。在那时，女性主义的逆流 (the contrary currents of feminism) 出现了一个引雷针 (a lightning rod)：色情制品 (pornography)。“反色情 (Antiporn) ”女性主义者在色情制品中看到了男性至上主义的意识形态训练场 (the ideological training ground)。 (罗宾·摩根 Robin Morgan 在1974年宣称：“色情制品是理论，而强奸则是实践”) TA们的女性主义对立方 (feminist opponents) 认为反色情运动 (the antiporn crusade) 是对否定女人的性主体性 (denied women sexual agency) 这一父权制世界观 (a patriarchal world view) 的巩固强化。在1982年4月，巴纳德性会议 (the Barnard Conference on Sexuality) 召开，用一位组织者的话来说，这是一场“对反色情制品运动的智识不诚实与沉闷 the intellectual dishonesty and dreariness 感到震惊”的女性主义者们的“出柜派对 (a coming out party) ”。在这次会议的概念文件中，人类学家卡罗尔·万斯 (Carole Vance) 呼吁承认性 (sex) 不只是一个危险的领域，也是一个“探索、快乐 (pleasure)、和主体性 (agency) ”的领域。

在会议召开前一周，反色情女性主义者开始向巴纳德大学的行政人员打电话抱怨，并且行政人员没收了“性会议日记（Diary of a Conference on Sexuality）”的副本（copies）——这是一本将分发给与会者的由论文、反思、和情欲图片（erotic images）组成的汇编（compilation）。在这个吸引了大约八百人的活动中，反色情女性主义者散发传单，指责组织者支持虐恋（sodomasochism）、对女人的暴力（violence against women）、和恋童（pedophilia）。女性主义报纸上充满了对会议的愤怒谴责以及愤慨不平的回复（indignant replies）。活动组织者描述这一后果是“猎巫和清洗（witch-hunting and purges）”；而在会议上主持研讨工作坊的盖尔·鲁宾（Gayle Rubin）在2011年写道，她仍然带着“亲身经历的恐惧（the horror of having been there）”。

在政治理论家洛那·N·布雷斯韦尔（Lorna N. Bracewell）对美国女性主义历史这段时期的启发性复述《为什么我们输掉了性战争：#MeToo 时代的性自由》（“Why We Lost the Sex Wars: Sexual Freedom in the #MeToo Era”）中，其对所谓的性战争是一场“猫斗/激烈争辩（catfight）”、“女人之间完全内部自相残杀的争吵”这样的标准叙述提出了质疑。在布雷斯韦尔看来，这个故事忽略了第三方利益集团（a third interest group）——自由主义者（liberals）——的关键作用，她认为，自由主义者最终驯化了（domesticated）反色情和支持色情的女性主义者（pro-porn feminists）的冲动（impulses）。在艾雷那·卡根（Elena Kagan）和卡斯·桑斯坦（Cass Sunstein）等自由派法律学者的影响下，反色情女性主义放弃了转换女人和男人之间关系的梦想，转而支持使用刑法（criminal law）把小范围的色情类别作为目标（target narrow categories of porn）。布雷斯韦尔认为，色情的“性激进”捍卫者（“Sex radical” defenders of porn）变成了平庸的“性积极”公民行动自由论者（“sex positive” civil libertarians），这些人在今天更关心的是捍卫男人们的正当法律程序之权利（men’s due-process rights），而不是培养反主流的性文化（sexual countercultures）。她认为，反色情和支持性的女性主义（antiporn and pro-sex feminism）都失去了其激进的、乌托邦式的尖锐优势（radical, utopian edge）。

这种“两边都有瘟疫（plague-on-both-their-houses）”的诊断已广泛传播（has gained currency）。在2019年一篇关于安德里亚·德沃金（Andrea Dworkin）的文章中，莫伊拉·多尼根（Moirá Donegan）写道：“性积极（sex positivity）在推广（promotion）性文化之各个方面这个方式上变得像反色情女性主义者谴责父权制之下的性实践（sexual practices）一样咄咄逼人和漫不经心（strident and incurious）。”然而，无可比拟的麦琪·尼尔森（the inimitable Maggie Nelson）在她的新书《论自由：关怀与约束的四曲》（“On Freedom: Four Songs of Care and Constraint”）中认为这种对性积极的轻蔑描述是一种“稻草人谬见”。她说，怀疑者（skeptics）忘记了其至关重要的历史背景——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的女性主义和酷儿艾滋行动（the feminist and queer aids activism）。尼尔森写道，对这些活动

家们 (activists) 来说, 性积极是一种——“在面对那些不在乎你死活 (许多人宁愿你死) 的恶毒偏执的道德家 (viciously bigoted moralists) 时, 坚持认为你完全有权利拥有你的生命力和性表达 (life force and sexual expression), 即便文化在告诉你, 你的欲望是一张死刑执行令 (death warrant) ——的坚持。”

布雷斯韦尔和尼尔森都提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 即如何看待女性主义内部的分歧不满 (disagreements)。在男性主导的左派 (the male-dominated left) 内部——例如E.P.汤普森 (E. P. Thompson) 和斯图尔特·霍尔 (Stuart Hall) 之间关于路易斯·阿尔都塞的结构主义 (Louis Althusser's structuralism) 的著名分歧 (rifts) ——被认为是对于智识可能性的启发性映现 (instructive mappings of intellectual possibility), 是有待“思考解决 (worked through)”的辩论, 而女性主义者则倾向于将其运动过去的伟大“战争 (wars)”描绘为是警告或耻辱之来源 (warnings or sources of shame)。这并不是要否认女性主义辩论可以有一种特殊的情感共鸣 (emotional resonance)。希拉·罗伯坦虽然不反对重提 (relitigating) 旧有争论 (特别是与家务劳动工资运动 the Wages for Housework campaign 的创始人塞尔玛·詹姆斯 Selma James 的争辩), 但她承认“将个人与政治联系起来 (connecting the personal with the political)”可能给运动 (the movement) 带来一个特别的问题: “当断裂出现时, 这些断裂被证明会是更加痛苦的。”她解释道, “从理论上讲, 我不赞同, 因为我们是女人所以我们会消除政治冲突, 这一概念, 但是在情感上, 就像许多其它女性主义者一样, 我对我们创造出一个新的和谐政治 (a new politics of harmony) 的愿景很执着依恋 (was attached to)。”

作为一名教授, 我在选修我的女性主义课程的学生中察觉了类似的希望, 尤其是女人们 (TA们中的大多数人是女人)。TA们中的许多人诉诸女性主义以寻求同志情谊 (camaraderie)、理解、社群。TA们想清晰阐述TA们经验中的共同真理 (shared truth), 并阅读伟大女性主义文本, 这些会揭示出TA们在政治上应追求的世界。换句话说, TA们想要的是类似于第二波女性主义 (the second wave) 的许多女人在增强社会与政治意识小组 (consciousness-raising groups) 中所经历的东西。正如英国女性主义者朱丽叶·米切尔 (Juliet Mitchell) 在1971年所说的那样, “女人们因为她们自己私人生活 (private lives) 中所遭遇的不明确挫折 (the unspecified frustration) 而进入运动”, 然后“发现她们认为是个人窘境 (individual dilemma) 的东西是其实是一种社会困境 (social predicament), 因此是一个政治问题。”

但我的女学生们很快就发现, 就像上一代人所发现的那样, 并不存在单一的 (monolithic) “女人经验 (women's experience)”: 她们的经验被阶级、种族、和国籍的区别所影响, 被她们是跨性/别 (trans) 还是顺性/别 (cis), 是基是直 (gay or straight) 所影响, 同时也

被政治本能——也就是她们对权威、等级制度 (hierarchy)、技术、社群、自由、风险、爱情的感受 (feelings) ——的较无法分类之区别 (the less classifiable distinctions of political instinct) 所影响。我的学生们很快就发现，女性主义理论的庞大身躯中布满着分歧不和。这有可能向TA们展示，思考解决“战争”可以是有智识生产性的 (intellectually productive)，甚至是振奋的。但我感觉到，一些小小的失望仍然存在着。尼尔森认为，从过去寻找解放可能性的曙光 (the glimmer of liberatory possibilities) “不可避免地产生了一种破灭的希望 (the dashed hope)，即某个人在某个地方可以 (could have) 或应已付诸 (should have enacted) 或确保 (ensured) 我们的解放 (our liberation)。”在女性主义内部，这种破灭的希望提供了“又一个责备自己的先辈们不够好的机会。”

今天，英美女性主义 (Anglo-American feminism) 内部最明显的战争是关于跨性/别女人 (trans women) 在运动中的位置，以及在更广泛的“女人 (women)”之范畴中的位置。许多排跨女性主义者 (trans-exclusionary feminists) ——杰曼·格里尔 (Germaine Greer)、希拉·杰弗里斯 (Sheila Jeffreys)、珍妮丝·雷蒙德 (Janice Raymond)、罗宾·摩根 (Robin Morgan) ——将TA们的世系 (lineage) 追溯到1970年代的激进女性主义：因此有了“排跨激进女性主义者 (trans-exclusionary radical feminist)”这个词，通常简写为带有贬义的“TERF”【译者不认为这个缩写有任何贬义，相反，充满着面对TERF们的侮辱攻击时的气愤】。但这个词可能会产生误导。正如凯蒂·贝克 (Katie J. M. Baker) 和苏菲·路易斯 (Sophie Lewis) 等年轻女性主义者们所言，当代的排跨运动 (trans-exclusionary movement) 可能与激进女性主义的遗产有关，也与社交媒体的激进化潜力 (the radicalizing potential of social media) 有着很大关系。在英国，排跨活动家们戴着纽扣，宣称TA们是“被妈妈网所激进化的 (Radicalised by Mumsnet)”——不列颠最大的家长线上平台。在留言板上，由于缺乏物质支持和社会承认 (a lack of material support and social recognition) 而感到愤愤不平的 (justifiably aggrieved by) 妈妈们，被鼓励将愤怒指向“跨性/别游说 (trans lobby)”。

谈论“TERFs”也很容易让人忘记，许多激进女性主义者是跨儿包容的 (trans-inclusive)。正如评论家安德里亚·珑·楚 (Andrea Long Chu) 在她2018年的文章《论喜欢女人》 (“On Liking Women”) 中所指出的那样，关于跨性/别女人在运动中的位置的代表性对峙 (an emblematic confrontation) ——在1973年的西海岸蕾丝边会议 (the 1973 West Coast Lesbian Conference) 上的一个事件，在这事件中罗宾·摩根 (Robin Morgan) 谴责抨击跨儿民谣歌手贝丝·艾略特 (Beth Elliott) 是“一位机会主义者、潜入者 (infiltrator)、和破坏者”——远远比人们通常描述的要复杂。艾略特不仅是会议的表演者，而且是会议的组织者之一。而当摩根要求投票驱逐艾略特时，超过三分之二的与会者投了反对票。当激进女性主义最有影响力的理论家之一凯瑟琳·麦金农 (Catharine MacKinnon) 开始担任 性歧视律师

(sex-discrimination lawyer) 时，她选择了一名被监禁在男性监狱中的跨性/别女人作为她的第一批客户之一。在最近的一次采访中，麦金农说：“任何身份认同为女人、想成为女人、正作为女人四处奔波的人，在我看来，都是女人。”(Anybody who identifies as a woman, wants to be a woman, is going around being a woman, as far as I'm concerned, is a woman.)

麦金农的观点在年轻女性主义者中很普遍。在《被打断的女性主义》(“Feminism, Interrupted”)一书中，因为塞林那·托德(Selina Todd)的参加而从罗斯金纪念会议退出的一位黑人英国女性主义者，洛拉·奥卢费米(Lola Olufemi)，将“女人”描述为“我们为了提出政治要求而聚集在其下的保护伞(an umbrella)”。楚(Chu)则指出，这种想法甚至可以在第二波女性主义文本，像瓦莱丽·索拉纳斯的《人渣宣言》一样僵化顽固守旧的文本(as unreconstructed as Valerie Solanas's “SCUM Manifesto”【2】)中找到。在索拉纳斯的断言中，如果男人更聪明，他们就会努力把自己转变(transform)成女人，楚则看见了“一种跨性作为分离主义的愿景(a vision of transsexuality as separatism)，一个——从男到女的性别过渡(male-to-female gender transition)所可能表达的不仅仅是对男性性质的不认同(disidentification with maleness)而是对男人的脱离(disaffiliation with men)——的形象(an image)。”

【2】“SCUM”为“Society for Cutting Up Men”(宰绝男人社团)的缩写。——译注

不过，也有一些女性主义者因为TA们在意识形态上致力于(an ideological commitment to)TA们所认为的激进女性主义原则，而对跨性/别女人所自我声称的女人身份(trans women's claims to womanhood)持批判态度。特别是，性别是一种“社会建构”(gender is a “social construction”)的观点——用西蒙·德·波伏瓦的话来说，一个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成为一个女人”——被一些女性主义者用来说明没有经历过“女性社会化(female socialization)”的跨性/别女人不能成为女人。2015年，美国记者埃利诺·伯克特(Elinor Burkett)在《纽约时报》(Times)上表达了这种观点：“作为一个女人，意味着在一个对你作为女人而有所反应(reacted to you as one)的文化中累积了某些经验，忍受了某些屈辱(indignities)，享受了某些礼遇(courtesies)。”伯克特说，跨性/别女人“没有忍受过男人对着她们的乳房说话的商务会议，亦或者是在性事后惊恐地醒来，害怕自己前一天忘记吃避孕药(birth control pills)。她们不用非得在拥挤的地铁中应对月经的到来(onset)，不需要应对发现男性工作伙伴的支票比自己的大得多时所感到的羞辱，也没有必要担心自己太虚弱而无法抵御强奸犯。”不过，大多数当代排跨女性主义者坚持认为，跨性/别女人之所以不是女人，仅是因为作为一个“女人(woman)”是一个关于生物性别的问题(a matter of biological sex)。女人，正如TA们喜欢说的那样，“是成年人类女性(are adult human females)”，(在英国，TA们曾经把这句话贴在广告牌上)。

今天的排跨女性主义者通常声称，TA们寻求拆除压迫女孩和女人的性别制度（gender system）。然而，TA们倾向于巩固加强一种统治性观点（the dominant view），即认为某些身体必须以特定方式展现（present）。尽管这些人公开地（officially）站在布奇蕾丝边们（butch lesbians）【3】一边——TA们说布奇蕾丝边们的存在受到了“性别意识形态（gender ideology）”的威胁——但是排跨女性主义者支持着使得这样的女人进入公共空间变得不安危险（precarious）的法律：自“厕所战争（bathroom wars）”开始以来，英国的布奇蕾丝边们报告说她们在女厕所受到越来越多的骚扰。同时，排跨女性主义者经常批评跨性/别女人拥抱刻板的女性气质（embracing stereotypical femininity）。几年前，英国哲学家凯瑟林·斯托克（Kathleen Stock）【4】在推特上说，“我拒绝对于女人的退步式性别刻板印象（regressive gender stereotypes for women），这也是我不会屈从于一种意识形态的部分原因，这种意识形态坚持认为女人身份（womanhood）是一种感觉（a feeling），然后直接用1950年代的性歧视术语（sexist terms）来兑现（cashed out）。”在新书《物质性女孩：为什么现实对女性主义很重要》（“Material Girls: Why Reality Matters for Feminism”）中，斯托克稍微收回这种情绪（sentiment）：“指责跨性/别女人们被退步式的与女性相关的刻板印象（regressive female-associated stereotypes）所吸引似乎很奇怪，因为显然有着这么多非跨性/别女人们（non-trans women）也被这些刻板印象所吸引。”然而，这种暂时缓解（reprieve）是不完全的（partial）。她的观点是，作为跨儿（trans）——将自己沉浸在“虚构（fiction）”之中，这种虚构即一个人由于对‘异’性（the “opposite” sex）的强烈身份认同（a strong identification）而自己属于这种性——是一种在道德上可以容忍的性别不遵从行为的种类（a species of gender-nonconforming behavior），但在可能对非跨性/别女人构成任何风险的情况下则是不能容忍的。对斯托克来说，这个标准（bar）是如此之高，即便只是使用一位跨性/别者的正确代词这种情况（using a trans person’s pronouns），她自己也不清楚能否通过这个标准。一位记者最近告诉我，她觉得一位备受瞩目的跨性/别女人对女性气质的拥抱“很怪诞（grotesque）”。当《跨性别议题》（“The Transgender Issue”）一书的作者肖·法耶（Shon Faye）被邀请主持2018年国际特赦组织的“女人创造历史”（Amnesty International’s Women Making History）活动时，一位女性主义者在推特上发布了一张她的照片，描述上写着“一位生物男性（a biologically male person），扮演着一个充气娃娃。”

【3】 此处复制部分译者在之前的译文中所使用的翻译注解：“butch”一开始指的是性别表达为在社会意义上被视为（socially-perceived）男性化（masculine）的女同性恋者，又译为“顶”，但如今其含义更指向女性式男性气质（female masculinity）（可见 Jack Halberstam 的同名专著），同样可理解为是以一种酷儿化的方式表现、展演男性气质（来自跨儿、非二

元者、顺性别者等等)。目前比较可能出现在的使用是在, 顺性别女同性恋者的使用中。此处采用“布奇”这一音译以避免性别身份的定式化导致窄化其含义。——译注

【4】关于 Kathleen Stock 论点中的各种错误、以及懒散引用被原作者驳斥 (debunk) 的资料来试图立法限制跨性别者等行为, 可见 <https://www.praile.com/post/kathleen-stock-obe> 又或者最近英国媒体如何拥护 Stock 以宣传反跨, 见 <https://grace.substack.com/p/the-uk-media-has-seriously-bungled> 。——译注

同时, 排跨女性主义者经常奚落讥笑那些未能“充当 (pass)”为是顺性/别女人的跨性/别女人。2009年, 杰曼·格里尔 (Germaine Greer) 写道, “那些认为自己是女人, 有女人的名字, 穿着女性化衣服 (feminine clothes), 涂了很多眼影的人, 看起来...是一种令人恶心的拙劣戏仿 (ghastly parody)。”而这样的女性主义者往往对非二元者 (nonbinary people) ——非二元者们因为TA们拒绝性别区分 (gender distinction), 很有可能资格成为性别废除的最真实先锋 (have a good claim to being the truest vanguard of gender abolition) ——不屑一顾。

跨儿权益倡导者 (trans advocates) 通常将性别身份 gender identity (人们是否觉得自己是男性 male 或女性 female 或其TA身份) 和性别表达 gender expression (TA们如何自我呈现为是“女性化 feminine”或“男性化 masculine”) 两者加以区分。事实上, 这反差对比 (contrast) 并不总是明确标示的。将性别身份与性别表达区分开来的美国精神医学协会 (American Psychiatric Association), 把“强烈拒绝典型的男性化玩具、游戏、和活动 (typically masculine toys, games, and activities) 以及强烈避免激烈杂乱的玩耍 (a strong avoidance of rough-and-tumble play)”列为是识别判定跨性/别女孩 (trans girls) 的标准, 而对于跨性/别男孩来说则是, “强烈拒绝典型的女性化玩具、游戏、和活动。”英国跨性/别和非二元儿童 (trans and nonbinary children) 支持服务机构 Mermaids 的首席执行官在谈到她年轻的跨性/别女儿 (trans daughter) 时说, 在孩子知道什么是性别之前, “她所做的事情, 她的喜好, 她的行为方式, 都不属于我所认为的典型男孩行为 (typical boy behavior)。”

排跨女性主义者倾向于将这种说法 (statements) 解读成是在错误地暗示 (falsely suggesting), 成为男孩就是有意倾向于 (be disposed to) 以刻板的“男孩”方式进行思考、感受、和行为, 而成为女孩就是倾向于以刻板的“女孩”方式进行思考、感受、和行为。在这种观点中, 假小子女孩 (tomboy girls) 和女性化男孩 (feminine boys) 要么不存在 (TA们实际是跨性/别男孩和跨性/别女孩), 要么TA们是反常现象 (aberrations)。但是, 正如哲学家克里斯塔·彼得森 (Christa Peterson) 所指出的, 将性别化的行为 (gendered behavior) 视为是性别身份 (gender identity) 的证据, 并不需要预设 (presuppose) 性别

是一个倾向于以性别刻板印象的方式进行表演的问题（a matter of being inclined to perform in gender-stereotypical way）。例如，跨性/别男孩们被吸引去做一些刻板的“男孩”事情，是因为他们首先认同其他男孩是他们的性别（first identify other boys as being of their gender），并因此，他们把来自其他大多数男孩所做的和被期望做的事情作为其行为线索去行事（take their behavioral cues from）。这就意味着人们可能有先天的性别身份（innate gender identities），并以历史和文化偶然的方式（in historically and culturally contingent ways）表达自己。这种观点需要拒绝一些女性主义者所珍视的理论，即人类生来就没有任何先天的性别概念（innate gender concepts）。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作为一个男人或一个女人就是一个作为刻板的男性化或女性化的问题（a matter of being stereotypically masculine or feminine）。

这些都是微妙的区别（subtle distinctions）。但是，很少有排跨女性主义者会对跨性/别者谈论自己的微妙差异（subtleties）感兴趣。许多跨性/别者在阐述理清自己时，提到了先天性别身份的观点；许多人则没有。凯特·伯恩斯坦（Kate Bornstein）在2012年出版的回忆录《古怪且愉快的危险》（“A Queer and Pleasant Danger”），其副标题是“一位漂亮犹太男孩加入山达基教（Scientology）并在12年后离开，成为今天的可爱女士的真实故事”——直截了当地否定了这样的观点，即认为过渡（transition）必然是一个，为了确保一个人一直都是的性别得到社会承认，的问题（a matter of securing social recognition of the gender one always was）。在《跨越：回忆录》（“Crossing: A Memoir”）（1999年）中，迪尔德丽·麦克洛斯基（Deirdre McCloskey）把过渡（transition）与移民（immigration）作了比较：“我拜访了女人身份（womanhood），并留下了。”在《天王星上的公寓》（“An Apartment on Uranus”）中，保罗·B·普雷西亚多（Paul B. Preciado）将他的过渡描述是一个过程，“不是从一个点到另一个点的过程，而是作为生命所在的徘徊和中间状态的过程（of wandering and in-between-ness as the place of life）。一个不断的转变（transformation），没有固定的身份，没有固定的活动、或地址或国家”。肖·法耶（Shon Faye）写道，“我经常被指责，因为我是一个跨性/别女人，所以我是一种意识形态或议程的拥护者（proponent），即相信‘粉红色和蓝色大脑’，或者相信独立于社会和文化的先天性别身份，对此我感到惊讶和愤怒。我不相信这样的东西。”忽视这样的证词似乎使得排跨女性主义者更容易否认一个真相（the truth）：即许多跨性/别女人和男人是反对性别制度（against the gender system）的持异议者同伴（fellow-dissidents）。

关于身份的故事，即使是深刻的个人故事，也是对政治条件（political conditions）的反应。“生来如此（born this way）”这种叙事在争取男女同性恋权利（gay and lesbian rights）的斗争中已是至关重要的（has been crucial），其逻辑是，如果你不由得如此（if you can't help it），你就不应该为此受到惩罚。与此同时，这叙事也使得许多男女同性恋者（gay

and lesbian people) 感到窒息 (stifling) 。在2012年, 演员辛西亚·尼克松 (Cynthia Nixon) 激起了 L.G.B.T. 活动家的愤怒, 她说: “我曾是直 (straight) 也曾是基 (gay) , 而基 (gay) 更好。”她被指控是在暗示成为基 (being gay) 是一种选择, 从而对恐同者有利 (playing into the hands of homophobes) 。虽然这种反应在2012年是不可避免的, 但思考一下在今天是否也会如此反应, 是很有启发性的 (instructive) 。同性婚姻 (same-sex marriage) 的合法化以及同性恋者 (gay people) 在公共生活和大众文化中越来越多的可见性 (visibility) , 使得像尼克松这样的同性恋者更容易坦率直白地说出选择、欲望、和身份的心理复杂性 (psychic complexities) 。同样, 如果跨性/别者 (trans people) 获得了法律保护和社会承认 (social recognition) , TA们会不会更自由地说出自己生活/生命 (their lives) 的全部真相? 正如跨性/别者所指出的, TA们所讲述的关于自己的故事——最明显的就是, 当试图满足医疗把关者 (medical gatekeepers) 的要求时——往往都是那些非跨性/别者所要求讲述的故事。

精神分析评论家 (psychoanalytic critic) 杰奎琳·罗斯 (Jacqueline Rose) 在她的新文集《论暴力和对女人的暴力》 (“On Violence and On Violence Against Women”) 中发表了一篇题为“跨儿声音 (Trans Voices)”的文章, 她描写了跨性/别和顺性/别生活 (trans and cis lives) 之间存在着的一种连续性 (continuity) :

无论多么热切地渴望……过渡似乎很少给跨性/别女人或男人带来对自己身份的不容置疑的信心 (unassailable confidence) ……相反, 从TA们自己的评论中可以看出, 这个过程开启了一个关于性存在 (sexual being) 的问题, 而对这个问题往往不可能提供一个明确的答复。当然, 这对所有人类主体 (human subjects) 来说都是如此。性差异这一障碍 (the bar of sexual difference) 是无情的, 但这并不意味着那些认为自己接受其法则 (subscribe to its law) 的人, 对表面下 (beneath the surface) 发生的事情有丝毫的了解, 比那些不太愿意接受的人更了解……“顺性/别 (cis)”女人或男人——即, 非跨性/别 (non-trans) ——是一种诱饵 (decoy) , 是多重压抑 (multiple repressions) 的结果, 其未曾经历的故事 (unlived stories) 每晚都在我们的梦中浮现 (surface) 。

罗斯的观点是, 我们都在使用一个永远无法捕捉到人类心理之复杂性 (the complexity of the human psyche) 的二元结构 (a binary) 来压抑和容纳我们的不适 (repressing and accommodating our discomfort) 。这政治问题便是谁的容纳之处 (accommodations) 受到惩罚, 而谁的被允许。因此, 罗斯说, 任何敌视跨性别者 (transgender people) 的人都应该问自己: “你认为你是谁 (Who do you think you are) ? ”

在这把跨性/别者和非跨性/别者的经验（experience）联系起来的做法中，罗斯处于一个棘手的地带（tricky terrain）。建议暗示（suggest）顺性/别者对性别不安（gender dysphoria）有所了解，常被认为是恐跨的（transphobic），法耶将性别不安定义为是，一些跨性/别者所忍受着的与，性的身体特征（the physical traits of sex）以及这些特征所导致的别人对TA们作出反应的性别化方式（the gendered ways），有关的“强烈的焦虑（anxiety）、痛苦（distress）、或不快乐的感觉”。（其它人则认为性别不安仅仅是作为跨儿的条件 the condition of being trans，因此，根据定义，只有跨性/别者经历过这种情况。）声称顺性/别者可以经历（experience）类似于性别不安的东西，这让跨儿权益倡导者（trans advocates）感到担忧；TA们担心这会支持这样一种观点，比如，没有跨性/别男孩，只有困惑的顺性/别女孩（confused cis girls）。然而，当罗斯建议我们承认某些经历——例如，一些非跨性/别女孩（non-trans girls）在身体进入青春期时感到的严重痛苦（the acute distress），以及青春期在许多跨性/别男孩身上所激起的恐怖——能得到更多的收获，能以不同方式说明“性差异之障碍（bar of sexual difference）”所造成的痛苦时，她是有说服力的。

在《跨性别议题》中，法耶引用了安德里亚·珑·楚（Andrea Long Chu）对性别不安的描述，即“像心碎这样的感觉（feeling like heartbreak）”，接着她沿用了传统的说法（conventional line）：“性别不安在整个社会中是一种罕见的经历……这可能使它难以向绝大多数人解释。”诚然，对自己的身体感到足够痛苦而需要激素或手术干预的人是极少部分的。许多非跨性/别女人也确实知道一个背叛的身体（a body that betrays）所造成的心碎——它用不想要的乳房和臀部压制你（weighs you down）；它把你从行动的施为主体（an agent of action）变成男性欲望的对象（an object of male desire）；也就是，在某种令人羞愧的意义上（mortifying sense），不是你真正自我的反映（a reflection of who you really are）。这并不是说这种痛苦的确切特征、强度、或持续性对于跨性/别者和非跨性/别女人都是一样的。但是，如果以承认这种经验的连续性（a recognition of such continuities of experience）作为开始，女人之间的对话，无论是跨儿还是非跨儿，可能会是什么样子？

和罗斯一样，法耶也看到了跨儿解放（trans liberation）和更广泛的人类自由项目之间的联系。“我们对于许多非跨性/别者来说是希望的象征”，法耶写道，“TA们在我们的生活中看到了生活得更完全（fully）、更自由的可能性。”但法耶也敏锐地指出，正是跨性/别生活中所包含的可能性之感受（the sense of possibility），会推动排跨政治（drive trans-exclusionary politics）。“这就是为什么有些人讨厌我们：TA们被我们自由的灿烂丰裕（gleaming opulence）所惊恐，”法耶表示。那位称跨性/别女人对女性气质的拥抱“很怪诞”的记者还对捆束乳房（bind their breasts）的跨性/别男孩表示诧异（dismay）。与他们不同，她说，她从小就被告知要爱惜自己的身体（she had been told as a girl to love her

body)。排跨女性主义者经常谴责 (deplore) TA们所认为的跨性/别男孩受到的鼓励，即鼓励他们对自己的身体进行干预，而不是让自己容纳适应 (accommodate) 自己的身体。偶尔，我也会在TA们的反对声中察觉到一种类似于伤感向往的欲望 (wistful desire) 的低语。J.K.罗琳 (J. K. Rowling) 在2020年的一篇广为流传的 (viral) 文章中详述了她“对跨性/别权利运动”对年轻人“的影响的深切关注”，她写道，“我一直在想，如果我晚出生30年，我是否也会尝试过渡。逃离女人身份 (womanhood) 的诱惑是巨大的。”罗琳和其它人似乎在问，考虑到一代又一代的女人不得不学习过女人的生活，居住在女人的身体里，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选择不这样做，这事意味着什么？考虑到这种作为女人而生活对许多人来说是一种痛苦的经历，跨性/别女人有什么权利声称她们自己也有过且属于这种经历 (claim that experience as their own)？”“尽管我承认并支持男人有权利抛弃摆脱男性性质的衣钵职责 (throw off the mantle of maleness)”，那位美国记者伯克特 (Burkett) 写道，“但他们不能通过践踏我作为一个女人的尊严，来公开支持 (stake their claim) 自己对作为跨性别者 (transgender people) 的尊严。”

这种——认为别人的生活与自己不同 (someone else's life lived differently)，在某种程度上是对自己的侮辱冒犯 (affront) ——的观念 (sense)，这是一种熟悉的代际政治现象 (intergenerational political phenomenon)。我认为，我们在一些年长的，告诉 #MeToo 时刻 (moment) 的年轻女人要坚强起来，的女人们身上看到了这一点——因为这些人是在恶劣的环境下被迫这样做的——同时也在一些艾滋一代 (aids generation) 的男同性恋者 (gay men) 身上看到了这一点，他们无法调和许多年轻男同性恋者由于用药预防方案 PrEP (the drug regimen PrEP) 【5】而被释放到 (released into) 性事丰裕的自由 (the freedom of sexual promiscuity) 中。已故的安·斯尼托 (Ann Snitow) 是第二波女性主义团体“纽约激进女性主义者” (the second-wave group New York Radical Feminists) 的创始人，她一再警告不要怀旧。她写道：“在女性主义思想和行动中发明和再发明一种更复杂、更有抵抗力、和更性好奇 (sexually curious) 的种类 (strain)，这符合各代女性主义者的利益。”当在2019年斯尼托去世时，新的社会主义女性主义杂志《Lux》 (the new socialist-feminist magazine *Lux*) 的创始编辑萨拉·伦纳德 (Sarah Leonard) 写道，她是“我所见过的唯一一个似乎不受到，她所在领域的根本性范畴的消解 (the dissolution of the categories that were fundamental to her field) 以及该领域被接连几代人不断重塑，的威胁的人。她以变化为乐 (she *delighted* in change) 。”

【5】 PrEP 即 pre-exposure prophylaxis (暴露前预防措施) 的缩写。——译注

在《为什么我们输掉了性战争》中，布雷斯韦尔认为，如果妇女解放运动对黑人和第三世界的参与者 (Black and Third World participants) 给予更多关注，它本可以保持其激进的尖

锐优势 (radical edge)。在性战争“两边 (sides)”的有色人种女性主义者——艾丽斯·沃克 (Alice Walker)、帕特里夏·希尔·柯林斯 (Patricia Hill Collins)、切里·莫拉加 (Cherríe Moraga)、米尔萨·金塔纳勒斯 (Mirtha Quintanales) ——一再告诫人们不要使用监禁主义国家的权力 (the power of the carceral state) 来处理性的病态 (the pathologies of sex)，并设想一种基于根除种族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性自由形式 (a form of sexual freedom)。今天，活动家们毫不犹豫地同意，女性主义必须是“交叉的 (intersectional)”——也就是说，警惕父权制的运作受到种族、阶级、和其它压迫轴 (axes of oppression) 之影响 (inflected) 的复杂方式。然而，交叉性 (intersectionality) 往往被视为主要是一个国内关注 (a primarily domestic concern)。在最近与1974年《肯比河团体之声明》 (Combahee River Collective Statement)，交叉性女性主义的奠基性文件 (a founding document of intersectional feminism)，的作者之一芭芭拉·史密斯 (Barbara Smith) 的谈话中，黑人女性主义者洛雷塔·J·罗丝 (Loretta J. Ross) 指出：“在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我们的组织工作比我今天看到的要跨国得多 (more transnational)。”

“直接的、个人的国际主义 (internationalism)，”希拉·罗伯坦写道，“是姐妹情谊 (sisterhood) 的重要组成部分”。她的回忆录描述了对德国、意大利、西班牙、希腊、和法国的妇女运动的访问；花时间仔细研读朋友关于越南妇女代表团的笔记；以及研究妇女在古巴 (Cuba) 和阿尔及利亚 (Algeria) 的民族主义运动中所发挥的作用。在美国大受欢迎的，1970年由罗宾·摩根编辑的美国妇女解放运动文本选集《姐妹情谊是强大的》 (Sisterhood Is Powerful)，随后在1984年出版了《姐妹情谊是全球的》 (Sisterhood Is Global)，这是一本关于近70个国家的妇女运动的论文集，每篇论文都由在当地基层工作的女性主义理论家或活动家撰写。

这样的国际主义在英美女性主义中已基本消亡。这无疑与国际工人运动的广泛消亡终止 (demise) 有关，与普遍英美人的思想偏狭 (insularity) 倾向有关，也可能与互联网有关，它同时给了我们太多可以阅读的东西，也腐蚀了我们解读的能力。如今，因为女性主义如此普遍，在畅销书排行榜 (the best-seller lists) 和教学大纲 (the syllabi) 和推特上如此之多，我们似乎已经了解了它的一切。但是，不出所料地，仍有许多东西需要学习。伊藤诗织 (Shiori Itō) 的《黑箱》 (“Black Box”) 在今年以英文出版，是一个以第一人称视角叙述一位日本记者被一位知名电视人强奸后试图伸张正义的醒目故事。《黑箱》于2017年首次在日本出版，是日本 #MeToo 运动的核心，揭示了该国的文化和历史如何塑造了一个男性拥有性特权的特定体制 (a specific regime of male sexual entitlement)。这本书可以和张晓夏的《知道我的名字》 (“Know My Name”) 有启发性地一起阅读，这是她2019年关于被斯坦福大学学生布洛克·特纳 (Brock Turner) 性侵犯 (sexually assaulted) 的回忆录。

2017年3月8日，四十多个国家的数百万妇女参与了全球妇女罢工（the global Women's Strike）。这主要是通过阿根廷和波兰女性主义者的努力而产生的，TA们一直在各自国家领导着强大的运动。这场新的国际主义女性主义（internationalist feminism）中出现的两部最重要的作品是维罗尼卡·加戈的《女性主义国际：如何改变一切》（Verónica Gago's "Feminist International: How to Change Everything"）和埃瓦·马耶夫斯卡的《女性主义反法西斯主义：共通体的对抗性公众》（Ewa Majewska's "Feminist Antifascism: Counterpublics of the Common"）。加戈和马耶夫斯卡分别是阿根廷和波兰女性主义的核心人物，她们都记录了建立大规模激进联盟的实践（the practice of building large-scale radical coalitions），这是迄今为止英美女性主义者所无法达到的成就。加戈写道，这种联盟建立“不是自发的。它是经过耐心地编织和努力从事的”。

这两本书也都打开了令人振奋的理论视野。马耶夫斯卡认为，全球南方和“半边陲”（包括波兰）的“女性主义对抗性公众”（the “feminist counterpublics” of the Global South and the “semi-periphery” (including Poland)）是今天对抗法西斯主义之崛起的最有力的力量（the most potent force）。她提倡她所谓的，呼应沃尔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的，“弱抵抗”政治（a politics of “weak resistance”），与惯例的英雄主义模型（the customary model of heroism）形成对比。加戈则展示了“女性主义罢工（feminist strike）”如何超越传统范围（conventional parameters）——工会、工资关系、男性工人、男性老板——以吸引力工作者、原住民、失业者、非正统经济中的工人、家庭主妇。她讨论了“全体大会（general assembly）”，认为它既是一个抽象概念（“集体智识的情境化装置 a situated apparatus of collective intelligence”），也是一种具体的政治策略，使阿根廷女性主义者能够形成令人惊讶的结盟（alliances）。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一个贫民窟举行的一次集会中，附近的女人们解释说，她们不能罢工，因为她们管理着社区的流动救济厨房（soup kitchens），必须为有需要的居民提供食物，尤其是儿童。最后，集会找到了一个解决方案：这些女人们将通过分发生食（raw food）来进行罢工，取消烹饪和清洁的劳动。加戈认为，群众运动（Mass movements）不是通过软化其要求或缩小其范围，而是通过坚持激进主义来建成的。

这一承诺也体现在加戈和马耶夫斯卡的坚持中，即女性主义包括不只只是传统上被理解为是女人的人。她们说，它必须包括跨儿、酷儿、原住民（indigenous）、和工人阶级的人。尽管争取堕胎权的斗争对阿根廷和波兰的运动都很关键，但两者都没有明显强调“女性生理（female biology）”——对于那些认为群众女性主义团结（mass feminist solidarity）不能建立在任何其它基础（any other foundation）之上的人来说，这也许是一个教训。对加戈和马耶夫斯卡来说，生物本质主义（biological essentialism）是群众政治（mass politics）的敌人；毕竟，在这两个国家，就像在世界其它大部分地区一样，那些共谋压迫直顺女（straight cis women）的力量（forces）也是那些共谋反对同性恋者和跨性/别者的力量。（在

阿根廷和波兰，“性别意识形态 gender ideology”的主要反对者不是其它女性主义者，而是天主教会。）

不过，还是存在着不同意见的（dissensus）。在《女性主义国际》中，加戈使用了“女人（women）、蕾丝边（lesbians）、跨性/别者（trans people）、和易性者（travestis）”这样的措辞（phrase）——最后这一个术语被一些拉丁美洲的跨性/别女人使用，特别是性工作者。在一个脚注中，加戈解释说，这组表达方式（the formulation）“是多年辩论的结果”，且意味着要强调运动的“超越女人之范畴的包容性质（inclusive character beyond the category of women）”。2019年，女性主义集体运动“一个都不能少”（the feminist collective Ni Una Menos）组织的一次集会，当阿根廷女性主义激进组织（Feministas Radicales Independientes de Argentina）的成员轮到发言时——该组织成立于2017年，反对父权制、反对资本主义、反对卖淫（prostitution）、和反对承认跨性/别女人为女人——集会陷入了混乱。其它与会者大声抗议，其中一人，据称是一名跨性/别女人，对一名激进女性主义者（a radical feminist）进行了人身攻击。后来，“一个都不能少”（Ni Una Menos）发表了一份声明，建议下一次大会通过一项动议（motion），以正式确定该组织所说的通过了集体同意的内容：在未来的会议上不给排跨女性主义者提供平台。“阿根廷的运动是跨儿女性主义的（transfeminist），”一位女人争辩说。“这就是它的成长，伴随着跨儿和异装者之存在（the presence of trans and transvestites）成长。我们欠TA们这场运动，所以包含TA们是没有商量余地的。”对加戈来说，对“意外之外的结盟（unexpected alliances）”的追求使得意见分歧（discord）是不可避免的，但这不是羞耻的来源。她写道：“当我们不知道该怎么做的时候，我们就召开一场集会（we call an assembly）。”◆

本文发表在2021年9月13日的印刷版上，标题为《性战争》（*The Sex Wars*）。

阿米亚·斯里尼瓦桑（Amia Srinivasan）是牛津大学社会和政治理论齐切利教授（the Chichele Professor of Social and Political Theory at Oxford University），也是《性之权利：二十一世纪的女性主义》（*The Right to Sex: Feminism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的作者。